



大学生组职业队踢出怪味“校园足球”

孤独的北理工

本报记者 李志刚

以北京理工大学队球员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大运队，在日前结束的大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中2:3不敌日本，赛后这支球队的表现备受赞扬，该队主教练金志扬更是大声疾呼，“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太少了，而日本和韩国至少有五六十所‘北理工’。校园足球首先要有人去踏踏实实地做，但现在实践者太少了。”但所谓的“北理工模式”，是原汁原味的校园足球吗？很多行家并不那么看。行走“职业”和“校园”的边缘，北理工有着独特的灰色身份，在中国足球的范畴内，这种操作模式曲高和寡，苍白孤独。

“身份”尴尬挥之不去

北京理工大学原来的足球基础并不是特别好，但从2000年开始这一切发生了转变。当时北京理工大学为了寻找学校体育的突破口，决定整体引进BTV“三高队”的高中组队伍。组成这支队伍的学生都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但是和一些梯队的专业训练不同的是，他们在整个学习足球的过程中，始终没有放弃文化课学习，“高素质”就是“三高”之一。北京理工大学在经过基本的入学考试（并非正式的高考）之后，给这20个球员专门设置了一个班，由此理工大学开始拥有了一支高水平的大学生球队，球队主教练便是京师名帅金志扬。

在本届大运会之前，金志扬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，两次带领北理工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，分别排名第7和第15。北理工队在中国大学生联赛中更是战绩骄人，多次获得冠军。

但2006年该队参加中国足球乙级联赛获得冠军冲入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之后，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：第一个障碍出现在教育部那里，因为根据有关规定，高校不允许“养”职业球队。好在教育部还是表现出网开一面的态度，根据他们的解释，尽管北理工参加的是职业联赛，但球队组成人员都是大学生而非职业球员，所以不必受到规定的约束，结果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，北理工被挂在了大学生体协下面，获得了一个合法的身份：闯过了教育部这一关，北理工接下来又遇到了足协规定的牵绊，根据足协当时对中甲设定的准入资格，参赛球队首先必须以俱乐部形式注册，然后需要拥有容量超过两万人的专业球场，还要有完备的梯队建设，但北理工却根本不符合这些规定，最后为了帮助北理工顺利参赛，足协专门修改了规则，不再将以上硬性规定适用于北理工，允许后者将容量只有4000人的体育场作为主场。

职业赛场的边缘人

除了体制上的困境之外，北理工大

学队在近几年中甲联赛中，每年都要为运作奖金发愁。近些年来，中国足球开展新一轮的“烧钱运动”，水涨船高，一支中甲联赛每个赛季需要至少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。北理工大学队如今只有靠有限的赞助及部分校友的资助维持下去，和那些职业队高额的收入、豪华的住宿、训练条件相比，他们住着4人一间的学生宿舍，吃在学生食堂，自己动手洗衣服，依据所在年级高低，拿着从每月200元到1000元不等的足球奖学金作为全部收入……

尽管按照金志扬的说法，北理工大学队球员“绝对不愁出路”，但这些球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却不容乐观，因为缺少资金支持，没有外援助阵，该队近年来也一直在中甲降级区之内徘徊。在中甲混迹多年的北理工大学队，至今为止也只有3名球员成功转入职业球队。

这跟中国历史形成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有莫大的关系。中国足球历来是“文武”分离，学校只管教育，专业队主抓训练。进入大学讨生活的足球运动员，很大一部分是从各专业梯队淘汰下来的。比如在本届大运会上，来自天津师大的球队核心范志强，便曾经是天津泰达梯队的一员。2009年全运会上，因为追打裁判，被中国足协禁赛两年，这才入学成了大学生。

而在校园足球高度发达的日韩，学生球员从小学起便有正规的联赛，一直打到大学队，训练和比赛都非常系统，所以球员的能力与职业队员相差无几。在大运会上淘汰中国队的日本大运队，主要是由流通经济大学校队为班底组成的。这所大学是日本足球的名校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该学校为J联赛各级球队提供了42名球员。

现在效力于国米的后卫长友佑都，出自日本明治大学校队。以他的水平，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，竟然只能当拉拉队给队伍打鼓。日本大学足球的水平之高可见一斑。

难以回避的“话题”效应

虽然北理工球员的身份是大学生，

但是他们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大学生队伍吗？

该队主帅金志扬显然是这么看的。他说：“归根结底，足球是一项智能型运动，不是体能运动，搞明白怎么调动自己的智力，让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更出色些，这对亚洲球队很重要。”他认为“大力发展校园足球，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”，并说自己与北理工大学队，甘当中国足球发展的“铺路石”。

但部分足球界人士却认为金志扬的说法有“偷换概念”的嫌疑——北理工大学队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甲球队，已经不在大学生联赛的参赛队伍序列之中，如今举国皆赞北理工，真正的大学生联赛乃至整个校园联赛的水平到底如何，却没有人关心了。

“金指导校园足球拯救中国的说法，至少从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。”国内一位足球界业内人士日前这样说，“北理工大学队几乎是不可复制的。如果不是在北京，如果没有金志扬当教练，这支球队能够每年拉来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的赞助吗？本赛季中央电视台还直播该队部分场次的中甲比赛，这又是什么概念？别人能比吗？北理工只是一个个案，没有什么普遍性。”他认为北理工是借着“校园足球”的身份，以及金志扬的名头才得到这样的知名度，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学生足球的现状。

还有人对本届大运会中国男足由北理工大学队为主体组成表示质疑，“是的，我们承认这支球队的球员都拥有正规学历，但他们毕竟是参加了中国的中甲联赛的，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职业球员了。让一群接受过多年中甲联赛洗礼的大学生球员去参加大运会，即使拿了好成绩又能说明什么？按照我的观点，中国大运男足队，应该由纯粹的目前参加中国大学生联赛的球员组成。金志扬指导，带领一批中甲球员去踢大运会，现在又说校园足球如何如何，这简直就是偷换概念。”

北理工给人带来的光明和信心，远远无法抵消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。这究竟是先行者固有的悲哀，还是空想者注定的荒唐？至今为止没有答案。

校园足球

遭遇“跨界”之困

2009年6月，中国足协开展大力推进“校园足球”计划。今年7月，大连万达集团与中国足协签约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斥资5亿元人民币支持中国足球，而其中三分之一的资金将用于支持青训建设，“校园足球”作为青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这个时候自然更加引人关注。

事实上，尽管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开展“校园足球”计划，但成效究竟如何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教育、体育两大系统，究竟哪一个应该在“校园足球”计划中占据主动权，双方均在“暗战”，这便引起了“体教结合”、“教体结合”哪一个说法更合适、哪一个说法更有利于推动“校园足球”计划的争论。

以校园足球的开展范围为例，目前全国拥有30多万所中小学校，但仅有2200所学校开展了校园足球。而就是开展了校园足球的中小学校，其实施效果也难尽如人意，比如那些不是“试点”的学校，没能分到校园足球的任何经费，其工作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。事实上，校园足球活动虽由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文启动，但基本上以各地足协为主体，所有竞赛都由足协负责。有人形象地说，各地教育局只是在活动开展期间加盖公章，并没在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上参与校园足球。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点头，直接影响到各所学校的工作热情。前中国足协官员冯剑明便认为，如果校园足球由教育部主抓，把校园足球定为年终考核内容，所有校长都会积极支持，“在他们眼里，体育局的红头文件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，但教育局长签名的一个条子他们却都很在意”。

只是要想让中国足协吐出已经吃了一半的“蛋糕”，谈何容易：在体育界尤其是各地足协看来，如果让出“校园足球”的主导权，不仅意味着失去了财权和荣誉，还会在事实上伤害这一计划的实施质量，因为教育系统明显缺乏必需的足球专业技术人才，在指导学生练习、比赛时很容易出现偏差。

除了以谁为主导开展活动的争议之外，校园足球联赛的体系也需要衔接：现在校园足球活动只局限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并没有进入联赛序列。浅层次上，可能会导致覆盖面不足、足球受众人数缩小；深层次上，则会影响初中向高中、高中向大学输送足球人才脚步，制约校园足球活动的顺畅发展。

正是由于上述先天性的以及部分人为性的因素，如今中国“校园足球”的实施质量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。整个体系尚未搭建起来，以北理工这种整体收购队伍、打职业联赛锻炼的模式当然只能是个别现象。一位足球界有识之士认为，“中国足球的未来在青少年，校园足球必须引起大力重视，必须大力推进，但教育与体育之间的关系、职业球队选材途径的问题都很复杂，这显然不是韦迪或者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可以解决的。”（李志刚）